

The Suicide of Miss Xi: Democracy and Disenchantment in the Chinese Republic.
By Bryna Good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325.
\$41.00/£35.95 hardcover.

本書是美國奧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教授顧德曼（Bryna Goodman），繼1995年出版的名著——《家鄉、城市和國家：上海的地緣網絡與認同，1853–1937》後，又一力作。¹她在本書謝辭中說，早在撰寫前書時，她已在同鄉會檔案中看到許多有關席上珍自殺事件的史料，惟因前書的論題與寫作架構所限，只好先將它們擱在一邊（頁323）。直到2005年，在〈新女性自殺：報刊、文化記憶與新共和政體〉一文中，席上珍才首次成為她筆下的女主角。²不過，席上珍並不是她所關注的唯一一位女性自殺者，她在2006年發表的論文，便以1928年自殺的馬振華為研究對象。³從顧德曼並未將席上珍或馬振華的姓名放進論文標題，可見她當時對這兩位名噪一時的新聞人物究竟具有何種歷史意義仍感疑慮。經過十餘年的探索與沉澱，如今顧德曼終於心安理得地讓席上珍成為新著的標題與封面人物。

本書標題很容易讓讀者聯想到史景遷（Johnason Spence）的名作《婦人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⁴這兩部以個別女性的死亡為標題的專著，其實都更著重在描繪女主角身處的時代，但兩位作者的考量則迥然相異。史景遷因為王氏個人的相關史料稀缺，只能透過考察她所處的時空環境與文化氛圍，來探查乃至揣想她的人生際遇。顧德曼所關注的席上珍，則因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上海出版文化的蓬勃發展，文字記錄相對豐富；加上顧德曼勤勉地在不同語種的報刊、不同國家的檔案館中蒐集資料，不僅從中得知更多的細節，也注意到時人敘寫、詮解席上珍自殺事件的不同角度。顧德曼並不以梳理此案的來龍去脈

¹ 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² Bryna Goodman, “The New Woman Commits Suicide: The Press, Cultural Memory, and the New Republic,”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4.1 (Feb. 2005): 67–101.

³ Bryna Goodman, “Appealing to the Public: Newspaper Presentation and Adjudication of Emotio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1.2 (Apr. 2006): 32–69; 顧德曼：〈向公眾呼籲：1920年代中國報紙對情感的展示和評判〉，《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006年第14期，頁179–204。

⁴ Jonathan D. Spence,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8).

為滿足，她在長期探索的過程中，發現席上珍事件牽涉層面廣泛，從這一輻輳點出發，可以觸及辛亥革命後十年間中國歷史發展的各個重要面向，本書的討論範疇由此確立。

本書的結構相當特別。顧德曼並未循常例在前言中說明全書的問題意識及書寫架構，而是單刀直入地以「城市醜聞」(A Scandal in the City)為序章標題，敘寫席上珍自殺事件的發生、調查過程，相關當事人的背景，媒體報導與評論的走向，以及公權力介入的狀況與結果。在說故事的過程中，顧德曼陸續點出交織其中的重要歷史課題，如職業婦女的出現、泡沫經濟的發展、商人群體的崛起、印刷文化的勃興、軍閥政治的運作、租界體制的影響等等。接下來的四章，再分別從政治、性別、經濟與司法四個方面，進一步考察新生「民國」所遭遇的困境。

本書第一章題為〈上海的民主與虛有其表的共和〉(Shanghai Democracy and the Empty Republic)，但席上珍自殺事件如何與民主、共和這樣的大議題連結起來呢？顧德曼主要著眼於兩點：一是此事件發生後迅速被公開並引發公眾的關注與討論，二是男女主角平日在公共領域中的活動。顧德曼指出，1913年，當議會政治的宣揚者、國務總理熱門人選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後，選舉式民主在中國的發展便敲起喪鐘，但中國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空間並未完全消失。二十世紀初中國政府在外交上遭遇的連番挫折，更激發了民眾參與政治抗議運動的熱情，並促使知識分子對中國政治、社會與文化展開反省與批判。在中華民國這個代議機關無法發揮功能的民主政體中，社團與媒體承接了部份為公眾代言的任務。上海繁盛的商業、五方雜處的人群、兩界三方並存的政治局勢，則為社團與媒體提供了絕佳的發展環境。本書男主角湯節之是位十分活躍的政治、社會運動者，他不僅熱衷參與社團活動，且致力於推動所屬社團內部組織的民主化；他還創辦了以「工商業組織之言論機關」自許的《商報》，藉此結合社團與媒體的力量，鼓舞更多公眾參與政治和社會改革。女主角席上珍生前雖只是位年輕的報館職員，卻並未被排拒在公共領域之外。除了傳統的同鄉會外，她也參與了精武體育會、職業女子聯修會等新式社團，且曾在報刊上發表自己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席上珍自殺後，她所屬的洞庭東山同鄉會成為她的重要代言人，而她在職業女子聯修會結識的好友，則將她的作品提供給媒體記者，讓她原本並未引起公眾注意的發言，再次呈現於公眾眼前。

第二章題為〈新女性、鬼與無所不在的妾〉(The New Woman, the Ghost, and the Ubiquitous Concubine)，乍看之下似與前章無甚關聯，實則延續前章對

媒體功能的關注，並揭露二十世紀初中國「民主」、「共和」政體中最空虛的一環——性別平等的闕如。顧德曼首先指出，清末的改革論議雖已開始關注婦女問題，但即使到了辛亥革命後，女性還是無法享有公民權；就連那些熱衷爭取投票權的女子參政運動者，也大都不能平等看待她們未曾接受新式教育的姊妹。新文化運動時期，論者進一步提出，女性除須接受新式教育外，還須從事職業，如此才能藉擺脫「寄生蟲」、「花瓶」的角色，取得獨立的人格，而這正是成為公民的基本條件。席上珍的個案卻顯示，女性就算受過新式教育且從事職業，還是不免淪為縊鬼和侍妾，無法晉身公民之列。顧德曼雖將「鬼」列入本章標題，內文中也提及以自殺化為厲鬼作為報復手段的傳統信仰，但她並未針對這一面向多加申論，反倒更著重在說明時人賦予女性自殺行為的新詮釋。她敏銳地觀察到，二十世紀初，時人常將「舊式女子」的自殺事件視為「家務事」，自殺是她們無力改變自身處境的表徵；節烈婦女的自殺儘管仍能獲得政府的表彰、公眾的同情，但反思、質疑之聲也時有所聞。相形之下，時人在詮釋「新女性」的自殺時，常將自我毀滅視為一種彰顯個人主體性的行為，他們更期待自殺的女性不再只是身殉丈夫的節烈婦女，而是為公眾、國族犧牲的女英雄。顧德曼接著便將話鋒轉到「妾」的問題上。她發現，在席上珍事件的相關報導中，不少撰稿者都對兩性並存的工作空間懷有情色的遐想，他們尤其關心湯節之有意納席上珍為妾的指控。部份論者認為，受過新式教育的職業婦女，遭職場主管威逼利誘為妾，顯示「新女性」終究無法超脫受壓迫的宿命。有些論者則因席上珍採取自殺這種「傳統的」應對方式，而質疑她的「新女性」身份。另一方面，儘管湯節之堅稱納妾之說子虛烏有，不少論者還是相信這些接納女性進入職場的「新男性」別有用心，甚至指責熱心提倡婦女職業者是送羊入虎口。總而言之，在時人看來，席上珍之死不僅展現了「新女性」的無力，也凸顯了「新男性」的失敗，更嚴重打擊了他們對婦女職業論的信心。

席上珍與湯節之間的情感糾葛虛實難辨，但他們因投資而發生的財務紛爭則相對明確，本書第三章便從導致此一紛爭的「信交風潮」展開討論。所謂「信交風潮」，是指1921–1922年間，上海商民爭相購買交易所與信託公司股票所釀成的一場金融風暴。到目前為止，深入探討此一事件的研究成果仍不多見，英文論著更如鳳毛麟角。既有研究成果大都側重在說明交易所與信託公司的倡設者，如何高舉國族主義大旗、游說政府官員，乃至利用租界造成的國家管轄權缺口，

強渡關山。⁵顧德曼則不僅關心交易所與信託公司的籌辦過程，也重視上海民眾熱烈參與股票交易的現象。在她看來，二者都是公眾力量的展現。顧德曼指出，除了前人討論已多的中外商戰需要外，交易所與信託公司的西方淵源，也是倡設者證明其必要性的論據，但二者都無法完全掩飾倡設者謀取私利的動機；競爭者間的互相攻訐，更加深公眾對倡設者的疑慮。部份倡設者於是積極向中華民國政府申領執照，並接受其監理，以提高自身的公信力。不過，四分五裂的中華民國政府，本身的公信力已大有問題，租界的存在更使它的監理能力徒具虛名。中華民國政府核發的執照，因此並未成為交易所與信託公司成立的必要條件。至於上海民眾積極投入股票市場，顧德曼認為，交易所與信託公司大張旗鼓地刊登廣告、舉辦盛大的開幕儀式，固然引人注目，但媒體的大肆報導，更發揮了推波助瀾的效果。另一方面，時人與後世研究者常將1921年的股票投資熱潮與上海猖獗的賭風聯想在一起，顧德曼則別具隻眼地注意到，風行江南的五通神信仰，顯然也鼓勵著一般民眾進入市場追求財富。顧德曼還從席上珍的個案中發現，許多女性也積極加入這場投資熱潮，然而就像她們在政治與職場的遭遇一樣，她們被視為不適格的投資人，註定成為金融風暴的犧牲者。在信交風潮中，湯節之所創辦的信託公司和其他許多同業一樣倒閉收場，投資失利、求償無門的席上珍自殺殞命，先前積極為交易所和信託公司張目的媒體，以及他們所宣揚的自由經濟理念，都備受質疑。由國家主導的「統制經濟」，於是逐漸成為時人心中一個更好的選項。

席上珍死於自殺是個不爭的事實，但她的家人卻從一開始就認定她的僱主兼投資經手人湯節之必須為她的死負責；本書第四章詳述此案的究責過程，從中考察社團、媒體與法庭如何在不穩定的共和體制中主持正義。席上珍去世後，席家首先請求所屬的洞庭東山同鄉會出面與湯節之交涉。根據顧德曼的觀察，洞庭東山同鄉會最初並無意循法律途徑究責，湯節之則自始便採取法律手段維權。他先是請律師代他刊布聲明，表示席上珍之死與他毫無干係；然後在洞庭東山同鄉會

⁵ 如何旭艷：〈信託業在中國的興起——兼論「信交風潮」中的信託公司〉，《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頁187–212；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114–19；朱蔭貴：〈1921年「信交風潮」〉，《中國金融》2014年第20期，頁92–93；朱海城：〈法制與人情的博弈：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始末〉，《廣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頁134–41；朱海城：〈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興衰〉，《中國金融》2019年第21期，頁98–99。

向媒體控訴他誘騙席上珍購買股票且想納她為妾後，向租界裡的美國法院控告刊登相關報導的兩家登記在美商名下的媒體誹謗。湯節之的做法進一步激怒了洞庭東山同鄉會，它們因此向上海地方檢察廳告發湯節之涉嫌詐欺，並協助中國警察以極具爭議的方式逮捕了湯節之。湯節之和他的辯護人先是聲稱中國警察違例進入租界逮捕他，繼而主張席上珍自殺事件發生在公共租界，應由外國領事有權參與審判的會審公廨審理。這些尋求租界領事裁判權庇護的舉動，無疑與湯節之向來強調衛護中國主權的國族主義立場背道而馳。不過，顧德曼發現，租界當局並未積極回應湯節之的訴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領事裁判權的運作之所以能對租界中的華人發揮保護作用，是因為會審公廨可以拒絕中國政府的引渡、移送要求；湯節之既已遭中國政府羈押，租界當局便愛莫能助了。湯節之最後遭中國法院判決詐欺罪成立。顧德曼並未從法理層面檢討該案的審理程序或深究當時的詐欺罪構成要件，而是透過整理控、辯、審各方的論點，來展現此次裁判在論證上的諸多瑕疵。她認為承審法官的心證確實可能受到輿論的影響，但輿論對此一判決的影響程度，顯然不及林郁沁所研究的施劍翹案。⁶此案一進入司法程序，洞庭東山同鄉會的角色便迅速邊緣化，湯節之所屬的廣肇公所則開始積極地為他發聲，輿論因此不再一面倒地支持席上珍陣營。湯節之陣營的支持者宣稱，洞庭東山同鄉會與席上珍的家屬可能受司法機關操弄，而司法機關則無法拂逆淞滬護軍使何豐林制裁湯節之的指令。洞庭東山同鄉會與廣肇公所都強調自身是為會員爭取「公道」，但都不免招致護短的質疑。至於法院對湯節之的裁判，無論是受輿論的影響較大，還是受地方軍閥的指使較多，都已使時人將清末以來司法改革者高唱的「司法獨立」論視作空言。

中國在辛亥革命後建立了共和政體，此後十年間，更在上海發展出大量活躍的社團、豐富多樣的媒體、繁榮的市場經濟與西式的司法體制，女性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也明顯增加，這些現象向來被研究者視為中國邁向民主化的契機，但中國終究沒有達成民主化，顧德曼在本書第五章中，以「沒有共和的公共」(A public without a republic)一語來總括這樣的發展歷程。或許因為這是一部面向英語讀者的專著，顧德曼在此章中側重說明二十世紀初中國「公共」(public)的內涵與特色，而未對「共和」(republic)概念作任何釐清，⁷這使筆者覺得頗難充分

⁶ Eugenia Lean, *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把握作者的意思。就筆者理解，顧德曼所謂的「共和」，至少包括兩層意義：一是國家主權為人民共有，二是人民根據共同的準則來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決策與執行。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前者徒具虛名，後者則有待建立。在這種情況下，「公共」只能在有限的領域中發展，且難以形成共識。假使筆者的理解沒有太偏離顧德曼的想法的話，那麼「沒有共和的公共」顯然與史謙德（David Strand）所謂「未完成的共和」（an unfinished republic）構成一體的兩面，只是顧德曼悲觀地認為共和的完成遙遙無期。⁸

「除魅」（disenchantment）是本書副標題中的一個關鍵字，雖然顧德曼根本不會在本書內文中使用過這個字，更遑論加以詮解，但筆者認為這個只在封面出現的概念，其實與「沒有共和的公共」一樣具有洞見。筆者原本以為本書所要談的除魅，是二十世紀初的論者已不再像十七世紀時那樣以鬼神信仰來詮釋女性的死亡；而在閱讀過程中，筆者逐漸明白，顧德曼之所以將副標題定為「民主與除魅」，正是因為民主才是被除魅的對象。此前學界對中國民主化挫折的詮釋，常從傳統文化與保守勢力的掣肘立論，顧德曼則從時人對席上珍事件的討論中，發覺民主、共和、法治、自由市場、性別平權等觀念，因其源自歐美先進國家而取得的不證自明的正當性，正在接受質疑乃至挑戰。可惜顧德曼沒有告訴我們，在經過除魅以後，「沒有共和的公共」究竟會將中國帶向何方。

本書內容豐富，涉及的議題繁多，組織佈局殊為不易。書中各章均設小節，小節的數量不一，各節的篇幅也差異甚大。各節標題有靠左對齊與靠右對齊兩種格式，但筆者通讀全書後，仍未能洞悉此一區分的用意。顧德曼在下章節標題時，不甚講求前後節的邏輯連貫性，有時甚至會與內文不一致。例如本書第二章雖在標題中宣示將討論「鬼」的議題，實際上卻未多加著墨，反倒是在以「道德」和「正義」為主題的第四章中，專設一節來討論化鬼報復的信仰。本書的結構問題，有時可能會妨礙論點的推進。舉例來說，顧德曼在序章中介紹完席上珍與湯節之兩位主角後，便以「喋喋不休的小角色」（the rattled minor character）為標題，花了一頁多的篇幅來介紹湯節之不為人知的美籍猶太裔合夥人索科爾斯基

⁷ 關於二十世紀初中國「共和」概念的紛雜樣態，參見陳建華：〈「共和」的遺產——民國初年文學與文化的非激進主義轉型〉，《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151期（2015年10月），頁51–67。

⁸ David Strand, *An Unfinished Republic, Leading by Word and Deed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George Sokolsky)，此一介紹著重在說明他如何利用多重的身份認同穿梭於不同國籍與族裔的人群中，至於他如何協助湯節之與上海的英文媒體建立聯繫，則在別處零星地交代，這使顧德曼無法有效地展現跨國人際網絡的重要性及其具體影響。顧德曼在結論中再次提及索科爾斯基，顯示她對這個人物的重視，但她仍只將他作為呈現身份與人際關係複雜性的一個例證，而未能點出這個小角色究竟在主線故事中發揮了什麼作用。本書的細部架構雖未臻理想，可是由於作者的文筆十分流暢，並不至於妨礙讀者閱讀，而作者在內文中不時提出的洞見，更讓閱讀的過程充滿樂趣。

本書不只是一本專題論著，也可當作二十世紀初的上海史乃至中國史的通論著作來讀，在這樣豐富的內容中，史實錯誤卻並不多見，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深厚的研究功力。筆者注意到的僅有一處，即第112頁中提到，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發起人聘用的養成所翻譯郭外峰，之前任職於「橫濱俄日銀行」(Yokohama Russo-Japanese Bank)，經查橫濱並無俄日銀行，此處實為「華俄道勝銀行橫濱分行」(Russo-Chinese Bank, Yokohama branch)之誤。本書的詞彙表、參考書目整理工作，嚴謹程度則相形見绌。以詞彙表來說，前述的「郭外峰」即未列入。那些漏列的詞彙，若是廣為人知者，如頁72的「徐自華」，尚不至於影響閱讀；若是涉及專門領域者，如頁111提到的「三上豐夷」、頁117提到的「趙林士」，就可能對讀者造成困擾。參考書目中的“Archival and Manuscript Sources”標題，誤植為“Archival and Nanuscript Sources”，〈潮洲會館議案備查〉是顧德曼在上海檔案館中查得的文件，卻置於中日文論著類。

整體而言，本書雖有若干小疵，但瑕不掩瑜，仍是關心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讀者不容錯過的一部優秀作品。

孫慧敏

DOI: 10.29708/JCS.CUHK.202301_(76).00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